

朱天心:没有文学,世界会很单调



优雅知性的朱天心

十七岁因文成名,三十岁热心时事,四十岁与主流为敌,五十岁仍然不肯就范。作家朱天心的人生轨迹,每一个阶段都凸显着要跑偏的迹象。然而,她却始终行得很稳。12月4日,朱天心携新书《三十三年梦》来宁,在接受采访时,她说自己只是在做好一个作家,“不被纳入、不被收编,不怕被厌憎。”

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/文 牛华新/摄

1

十九岁的时候,朱天心出版散文集《击壤歌》。在为朱天心写的序言里,评论者一语惊天下,“自李白以来千有余年,却有一位朱天心写的《击壤歌》。”

惊到了天下,也让十几岁的少女本人吃惊不小。如此高起点的评价,裹挟着巨大的力量,一把将朱天心推进了台湾文坛。

《击壤歌》书写了北一女小虾三年的高中校园生活,丝丝缕缕的愁绪、青春的酸涩疼痛,是这部散文集的主基调。作品以零距离的逼真感,赢得了同龄读者的认同,出版后迅速风靡台湾校园。青春期写作成为朱天心这一时期的标签,小说《方舟上的日子》《长干行》,一直到二十四岁时创作的《时移事往》,读起来还是满满的青春疼痛。偏执、乖张,不肯就范,写作者的情绪和小说人物的情绪,似乎总是高度一致,要表达的内容也一眼可以捕捉到。

198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我记得……》被看作是朱天心创作的“断裂”。所谓的断裂,是她告别了青春书写,进入一个新的叙事领域。此后的朱天心,创作开始转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。1992年的《想我眷村的兄弟们》被认为是“眷村文学”的代表作。熟悉眷村生活的朱天心,塑造了一批眷村老兵的形象,他们大都性情孤僻,不擅长与周围的人相处。因为时代的原因,他们被迫远离故土,战后的宁静让他们能够均匀喘息,但又有种手足无措的失落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,朱天心的创作进入成熟期,在散文、时事杂文、小说几方面都有丰富的作品问世。她的小说创作主题,关注人物内心更深层次的需求,《古都》的主人公A沿着幽深之路在记忆与历史间行走,《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》里,中产背景的女性,没有外遇,也不想离婚,但“感情薄淡如隔夜冷茶,如冰块化了的温吞好酒,如久洗不肯再回原状的白T恤”。夫妻俩选择了一次治愈式的旅行,试图找回时间旅程里不该消失的坐标,但却以失败告终。

2

将近四十年后,回顾别人当初对

自己的评价,朱天心说:“吓坏我了。”一直到了今天,她自己还是觉得那是名实不符的评价。

“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从我的文字里看到了什么。我想,也许他感觉到飞扬跋扈的那种阳刚之气,给他的触动,和读李白的时候是相通的。有的评论者讲话是比较夸张的,他喜欢一个人,那种热情,恨不得天下人都知道这个人。就好比舞台,他看到一个触动他的人或者作品,就希望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这人身上,尽管这个人周围还有很多人。”

实际上,目睹朱天心早期的创作,评论者在赞叹之余,也有清晰的担忧。有人问二十几岁的朱天心:“以前是大家年纪小,大家都与天同在,与神同在,所以你与那些女孩子男孩子如同一人,而今是离开了神,只有你与这些人们。以前你是不知不觉都是写的神的显现,神的言语,而现在你用的是什么语言,写的什么现象呢?连后四十回的《红楼梦》也是在这一点上烦恼了,不说失败,也是失意,然则今后朱天心将怎样来打开这一关呢?”

这个问题,几乎是每个少年成名的作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。好梦正酣的朱天心,突然被洒了一身冷水,问了一个三十年以后甚至四十年以后才要面对的问题。她能做的,就是把问题一把推开,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写。

2015年,朱天心的《三十三年梦》在台湾出版;2017年,在大陆出版。这是一本对之前33年生活的总结梳理之作。“20岁的时候我去京都,到开笔写的时候算起来正好33年,这一路走来京都我去了超过30次。我把京都当一个舞台,把每一次舞台上发生的事情,还有这个舞台(京都)和那个舞台(台北)之间的事情都做交代。”

朱天心拒绝把这本书称作回忆录,因为她还在继续写,而且期望写出和之前不一样的作品。“我从十五六岁开始写,如果写到六十岁,还是一样,那真是太失败了。我不要这样的创作态度,我的写作,忠于每一个年龄状态所思考体验的东西,随着成长老去,这种转变是势必的。”

朱天心觉得,出《三十三年梦》,无非是希望先把个人这三三十年,跟

一己有关的事情或是想法,先给它打包,整理一下。就像到一个城市旅游,如果呆不长,大行李一定要找到寄物柜,寄在车站。然后背一个包,拿一瓶水,带一个手机,可以比较轻松地上路。接下来,她将要进入长篇的写作,写她在场的这三十年的台湾。这三十年,变动得非常厉害,正好也是她个人的生涯,从愤怒青年到相对成熟到初老。作为一个作家,她觉得应该完粮纳税,交回一份来此时此地应该做的答卷。

3

朱天心的人生轨迹,每一个阶段都凸显着要跑偏的迹象。然而,她却出人意料地行得稳。年少成名的作家必须要面对的那个关,不知不觉地就打开了,跨过去了。

那个特立独行、激昂飞扬的朱天心已经五十九岁了。她的步态优雅,声音温柔,可是她依然不肯驯服于这个社会。

“不管是十五岁时所处的时空,还是五十岁或者六十岁所处的时空,你不肯从此就范,不肯与时人同调。年轻的时候,能对抗的是传统、师长或者是学校里的教官,会做一些很无聊的小怪,比如逃课,来挑战这个体制。到了一定年纪,觉得对大多数主流在追寻的价值依然不同意。”

朱天心的不驯服,用她自己的话说,已经“无比激烈到令人讨厌”。她写那些小众的被忽视被伤害的人物,她参与那些在主流看来是“多余”的社会活动,而且不惧与主流为敌。《三十三年梦》里,她的不驯服可见一斑。2003年,她与侯孝贤等人发起“族群平等联盟”,林怀民、柏杨曾经答应加入,但见报后要求撤销。朱天心很坦白地将事情写出来,即使可能伤害到现实生活中和他们的关系。

“有一些人,私底下对别人有刻薄的评价,但是见面之后,依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。为什么要这样?你明明厌憎这个人,可为什么要表面这么和气?大家老是怪这个社会,但却不愿意做打破潜台词的人。当然,我要强调我谈的还是他们公共行为,是可以被讨论的,并不是谈论他们的私德。”

偏执、乖张,不肯就范,《击壤歌》里的小虾还在。

空,你不肯从此就范,不肯与时人同调。
 「不管是十五岁时所处的时空,还是五十岁或者六十岁所处的时

对话

内举不避亲 我非常喜欢朱天文

读品:在您所有的作品里,最满意的是哪一篇?

朱天心:我通常的制式回答是,每一个都像自己的小孩,可其实我不想用那样的回答。最近的散文《三十三年梦》,是铆足劲写的,散文我会说是这一本。小说是《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》。喜不喜欢哪部作品,是看它有没有抓到你打算表达的东西。这两本比较靠近我现在的年纪和状况,对我来讲,达成率比较高。

读品:您现在的日常生活状态是什么样?

朱天心:每天要是没有什么外加特别的事情,例如评审会议、演讲或是要去帮忙救援流浪动物,我基本上规律是每天早晨9点跟唐诺、谢海盟,会进到咖啡馆,借人家的桌子来工作。不能写就看,有时候是发呆一上午。咬咬牙,能写多少字就写多少字。下午两点,我们会离开咖啡馆。如果没有外加的事情。我会跟海盟一直走路,整个台北市,我们有很多的目的。晚上会去喂流浪猫,定点定时喂。

读品:感觉您的物质要求并不高。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快乐、满足,或者说平静?

朱天心:自由吧。我没有对物质看得很淡,只是我提早看明白它。很多人失去很多自由和时间,先去赚钱,赚到再说。我放弃很多可以赚钱的机会,拥有大量的时间和自由,我觉得这也是我用另一种方式买来的。其实作家常常会碰到瓶颈,可是你如果需要等米下锅,惦记着买好车,你就只好回头去写你熟悉的。因为熟悉的,读者已经肯定,评论已经肯定,甚至奖项已经肯定,你会自我重复,放弃了攀一次高峰的机会。我不要落到这样的处境。我很珍惜时间和自由,每一篇创作可以养成的时间都不同,应该给它空间让它成长出来。

读品:你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?

朱天心:我很怕回答这个问题,因为不同年龄段给出来的会是不同的一批名单。我也很怕现在答的是日后我会后悔的答案。我从二十几岁以来,一直在读的有纳博科夫、马尔克斯、格雷厄姆·格林,中国的作家,我喜欢钟阿城的东西,二十几岁看到现在,会反复看。另外,内举不避亲,我非常喜欢朱天文。

读品:文学的价值是什么?

朱天心:我不习惯人家热烈阐述文学的重要性,好像老王卖瓜。我有文学的自尊心,我不要叫卖。但我可以很严肃地列出,如果没有文学会怎样。要是没有文学的话,这个世界会很单调、自闭、愚蠢,让你以为这个世界只剩下眼下的这个世界,如果不满意,简直无路可逃。



扫码观看
 朱天心谈文学



朱天心

祖籍山东临朐,1958年生于高雄凤山。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。曾主编“三三集刊”,并多次荣获时报文学奖以及联合报小说奖。作品有《击壤歌》《方舟上的日子》《昨日当我年轻时》《古都》《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》《三十三年梦》等。

大读家

读书人,写作者
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